

古代黠戛斯人“斫面”习俗小考

孟楠

(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 内容摘要: “斫面”, 又作“梨面”、“裂面”、“割面”, 是我国古代西北及北方一些少数民族在举行丧葬、送行、诉冤等活动时的一种古老而又奇异的风俗。古代黠戛斯人是否也存在着“斫面”习俗, 在唐宋文献的记载中有分歧, 本文通过对汉文文献、少数民族资料和俄文资料的分析, 着重对此问题进行了考释, 认为唐代的黠戛斯人的确存在着丧葬时“刀斫其面”的习俗。

关键词: 古代 柯尔克孜 斫面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斫面”, 又作“梨面”、“裂面”、“割面”。《说文解字》云:“斫, 剥也, 划也, 从刀。”“斫面”即以刀划面, 这是我国古代西北及北方一些少数民族在举行丧葬、送行、诉冤等活动时的一种古老而又奇异的风俗, 曾广泛流行于古代匈奴、西域诸族、嚙哒、氐羌、突厥、回鹘、吐蕃、党项、汪古、女真、回回等民族中。在唐代, 甚至一些汉人也受到这种习俗的影响, 可见其影响之广泛。

“斫面”习俗主要见于古代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及印欧语系各民族中, 其起源甚早。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在其名著《历史》中, 曾提到斯基提亚人(Scythia, 又译为“西徐亚人”、“斯基泰人”或“塞人”)在其国王死时, “接受尸体的人和王族斯基提亚人做同样的事情, 这就是: 他们割掉他们的耳朵的一部分, 剃掉了他们的头, 绕着他们的臂部切一些伤痕, 切伤他们的前额和鼻子”。¹这种习俗在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诸如突厥、回鹘人中更为常见, 唐代文献中对此记载甚详, 如《周书·突厥传》载“死者, 停尸于帐, 子孙及诸亲属男女, 各杀羊马, 陈于帐前, 祭之。绕帐走马七匝, 一诣帐门, 以刀斫面, 且哭, 血泪俱流, 如此者七度, 乃止。”“葬之日, 亲属设祭, 及走马斫面, 如初死之仪”。但奇怪的是, 与古代突厥、回鹘等民族同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 并且在经济、社会发展及生活习俗都比较接近的黠戛斯人, 是否也存在着“斫面”习俗, 却在唐宋文献的记载中有分歧, 本文着重对此问题进行考释。

“黠戛斯”即今柯尔克孜族, 在汉文史籍中, 《史记》最早著录此族, 称为“鬲昆”, 此后在史籍中有种种不同的译写。汉魏时期常译为“坚昆”, 南北朝至隋时, 则用“结骨”、“纥骨”等, 唐朝时常用“坚昆”、“黠戛斯”, 蒙古至元明时期常用“吉利吉思”、“乞儿吉思”。

唐代的杜佑在记载结骨人(即黠戛斯人)的风俗时说“其俗大率与突厥同”, “若死, 唯哭三声, 不斫面, 火葬收其骨, 踰年而为坟墓, 以木为室, 覆以木皮”²。其后北宋初年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也沿用了这种说法, 黠戛斯人“死, 唯哭三声, 不斫面, 火葬收其骨, 踰年而为坟墓”³; 宋祁、欧阳修于1060年重修并完成《新唐书》时, 将“黠戛斯传”附于该书卷217《回鹘传》中, 说黠戛斯人的习俗是“丧不斫面, 三环尸哭, 乃火之, 收其骨, 岁而乃墓, 然后哭泣有节”。

然而北宋王溥于961年写成的《唐会要》(该书成书年代比《太平寰宇记》和《新唐书》都早)在记载黠戛斯人的习俗时并未采用杜佑的说法, 而是这样记载黠戛斯人的丧俗:“死丧刀斫其面”; 1013年成书的由王钦若等修撰的《册府元龟》卷961《外臣部·土风三》“结骨”条中也载结骨人(黠戛斯人)“其俗大率与突厥同”, “死, 葬丧刀斫其面, 火葬收其骨, 踰年而为坟墓, 有哭泣之礼”。

这样, 唐宋文献中关于黠戛斯人丧俗中的“斫面”问题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

13世纪50—60年代, 意大利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普诺·卡尔平尼(又译为“柏朗嘉

宾”、“普兰诺·加宾尼”、“普兰·迦儿宾”)和法国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又译为“鲁不鲁乞”)曾游历蒙古,两人分别著有《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又译为《蒙古史》、《蒙古人的历史》)和《鲁布鲁克东行纪》(又译为《鲁不鲁乞东游记》、《东方国家行纪》)。《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在时间上最晚和在质量上最佳的一个版本”是范登温加尔神父所刊行的1929年佛罗伦萨版⁴,1955年,英国学者道森根据范登温加尔版原文由伦敦出版了《出使蒙古记》英译本,本书收录了《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题名为《蒙古史》)和《鲁布鲁克东行纪》(题名为《鲁不鲁乞东游记》)。1911年,俄国圣彼得堡出版了俄国学者马列英从拉丁文译为俄文的普兰·迦儿宾的《蒙古人的历史》和鲁布鲁克的《东方国家行纪》,1954年,苏联学者沙斯契娜夫人又根据马列英的俄译本为底本,并吸收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加以注释,由莫斯科于1957年出版。1965年,余大钧先生根据马列英和沙斯契娜俄文译注本把普兰·迦儿宾的《蒙古人的历史》翻译为中文,发表在内蒙古大学内部交流学术刊物《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上,以后又收入余大均译文集《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以下简称余译本)。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吕浦译、周良霄注的汉译本《出使蒙古记》(以下简称吕译本)。这个译本主要根据道森本翻译,同时“参考了柔克义、沙斯契娜的注本和有关的中外史籍,增加一些注释。”⁵1965年巴黎出版了法国学者贝凯和韩百诗译注的法文译本,该版本也是根据范登温加尔本考订而成。中国学者耿昇则根据法文本并参照道森本将柏朗嘉宾的《蒙古史》译为中文,题名为《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以下简称耿译本);何高济根据美国学者柔克义英译本(1900年纽约-伦敦版,题名为《鲁布鲁克的威廉行纪》)和道森本翻译了《鲁布鲁克东行纪》(以下简称何译本),1985年,中华书局将耿昇和何高济的汉译本合为一书作为《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的一种予以出版。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耿译本记载了一个民族的髡面习俗。该书第5章32节写道:“在这一时期,窝阔台差遣绰儿马罕统率一支大军南征乞儿吉思人,窝阔台以武力征服了这一地区。这些人都是异教徒,光下巴上没有胡须。他们的风俗习惯如下:当某人的父亲死亡后,悼痛使其儿子们从面部撕下一条肉,从一个耳朵撕到另一个耳朵,以髡面表哀悼。”⁶根据耿译本附录二“译名对照”,这里的“乞儿吉思人”原文为Kergis。如果柏朗嘉宾在这里所记载的Kergis果真就是指的“乞儿吉思人”的话,那么,这将成为黠戛斯人中存在髡面习俗的重要证据。但该段文字在吕译本中却译为“同时,窝阔台汗派遣擗力蛮率领一支军队向南进军,去攻击薛儿客速人(Kergis),他在交战中打败了他们。这些人是异教徒,他们没有胡子。他们有这样一种风俗:当一个的父亲死去时,由于悲哀,他就在脸上从事耳朵至另一只耳朵剥下一条皮,作为哀悼的表示。”⁷吕译本译注者在这里仅对文中描述的风俗作了注释:“这里所描写的无疑是髡面服丧的风俗。”⁸余译本译文为“同时,窝阔台派旭烈兀带军队去南征撒耳柯思人,把他们打败了。撒耳柯思人是偶像教徒,没留胡须;他们有如下风俗:父亲死后,他们髡面示哀,在一耳至另一耳之间割一条刀痕。”⁹俄译本对此注释云:“普兰·迦儿宾此处系指撒耳柯思而言。后面他又用这同一名词来表示乞儿吉思。”¹⁰由此,学者对此处所说拥有“髡面”习俗的民族到底是乞儿吉思人,还是薛儿客速人(撒耳柯思人)就产生了分歧。

已故冯承钧先生曾指出:“Circassiens 一作 Tcherkesses, 一作 Cherkes,《元秘史》作薛儿客速,又作薛儿格速,《元史·西北地附录》作撒耳柯思¹¹,《蒙古游牧记》注作色尔克斯。拉施特《史集》有此名,为高加索北之一支民族。”¹²显然,“乞儿吉思”与“薛儿客速”(撒耳柯思)是两个不同的民族。

实际上,在《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和《鲁布鲁克东行纪》中都提到了两个不同的民族Kergis (Kerkis)和Cārcassiens (Circassiens),各汉译本都根据不同的底本或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其翻译为不同的民族名称。如上述《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关于髡面习俗的一段文字,吕译本将Kergis译为“薛儿客速人”,余译本将К е р г и с译为“撒耳柯思人”,而耿译本则将Kergis译为“乞儿吉思人”。《柏朗嘉宾蒙古行纪》第5章15节还曾记载“就在成吉思汗调拨其余诸路兵马的时候,他也穿过乞儿吉思人(Kergis)地区而御驾东征,但未

能奏捷。据那里人对我们所言，成吉思汗大军一直挺进至里海山脉一带”（耿译本第 51 页）。法国学者韩百诗对此处的 Kergis 加以注释说：“范登温加尔版本第 61 页注 3 中认为，这里系指叶尼塞河流域的乞儿吉思人，由于其中提到了‘里海山脉’，所以使人联想到文中本意并非指乞儿吉思人（Kergis），而是指薛儿客速人（Circassiens）。乞儿吉思一词（范登温加尔版本第 74 页）是在论述至绰儿马罕于 1229—1231 年对太和岭（Caucase，高加索）和小亚细亚的远征时才出现的。因此，这一名词系指这些地区的一个民族，从各种迹象来看，很可能是指薛儿客速人（Circassiens）。另外，范登温加尔版本中确实也辨认出了鲁布鲁克游记中的薛儿客速人，其中把此名称记载作 Kerkis”（见耿译本第 133 页）。余译本把这里的 К е р г и с 译为“撒耳柯思人”（见余译本第 364 页），俄译本马列英原注说“即太和岭（高加索山）的撒耳柯思人，撒耳柯思人于 1227 年为蒙古人所征服；乞儿吉思人则早在 1207 年就被打败了（见余译本第 416 页）。吕译本也把这段文字中的 Kergis 译为“薛儿客速”（见吕译本第 23 页），并且汉译者在这里加了一个注释：“Kergis = 突厥语 Čärkäs。中世纪 Circassians 之称呼。《蒙古秘史》作 Särkäsüt 和 Särğäsüt（Särkäs、Särğäs 之复数形式），旁译作薛儿客速惕；《元史》卷 22 作徹儿怯思，卷 63 作撒耳柯思；《元典章》卷 1 作撒里哥思”（吕译本第 77 页）。此外，《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还在第 7 章 9 节和第 9 章 20 节与阿速人（也是高加索北部的民族）一同提到了 Cärcassiens（Circassiens 或 Circassians、Ч и р к а с ы）（见吕译本第 40、57 页；耿译本第 73、93 页；余译本第 379、393 页），三种汉译本均将其正确地译写为“薛儿客速人”或“撒耳柯思人”。

《鲁布鲁克东行纪》的各种版本中，似乎只用了一个词 Kergis（Kerkis）来反映“乞儿吉思”和“薛儿客速”两个不同的民族。如鲁布鲁克在到达和林城南汪吉河（今蒙古翁金河）蒙哥冬季营地后说，在此处的“北面同样没有城镇，只有一支牧羊的民族，叫做乞儿乞思（Kerkis）”。吕译本和何译本均将此处的 Kerkis 译为“乞儿乞思”（乞儿吉思），这无疑是正确的（见吕译本第 189 页，何译本第 279 页）。该书第 5 章 5 节在谈到各地给蒙古人贡奉物品时，也提到 Kerkis 人送来了珍贵的毛皮，吕译本和何译本同样都将此处的 Kerkis 译为“乞儿吉思”或“吉尔吉斯”（见吕译本第 119 页，何译本第 216 页），并且吕译本的译者对此处的 Kerkis 加以注释说“Kerkis，作者通常以之称呼薛儿克速人 Cherkess，然此处当指乞儿吉思人 Kirghiz。”。在本书第 14 章 18 章中，当鲁布鲁克把阿速人与 Kerkis 人并提时，吕译本与何译本则均将此处的 Kerkis 译为“薛儿客速人”或“撒耳柯思人”（见吕译本第 134、141 页；何译本第 230、237 页），而何译本的译者在该书附录“译名对照表”中对 Kerkis 予以说明：“据柔克义的意见，此名在不同地方代表不同地名”（何译本第 343 页）。由此看来，《鲁布鲁克东行纪》中的“Kerkis”一词，是不能全部理解为“乞儿吉思人”的，在阅读文献时，我们应当根据其记载的不同情况，而把该词分别认定为“乞儿吉思人”或“薛儿客速人”。

其实针对《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关于 Kergis 人斫面习俗这段文字的记载，俄国东方学家巴托尔德早有考证。他在 1927 年写成的《吉尔吉斯史纲》中就曾指出：“柏朗嘉宾提到了 К е р г и с 人，但看来此称并非指乞儿吉思人（К и р г и з ），而是指薛儿客速人（Ч е р к е с ）。”¹³

从中外学者的分析来看，无论是《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还是《鲁布鲁克东行纪》都曾记载了两个不同的民族“乞儿吉思人”和“薛儿客速人”。由于游记作者或由于版本不同的原因，书中所出现的 Kergis 或 Kerkis 所指应有所不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将其分别认定为“乞儿吉思人”或“薛儿客速人”。因此，《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所记载的拥有斫面习俗的 Kergis 人，并不是乞儿吉思人，而应当视为“薛儿客速人”。

俄国和中国学者在讨论黠戛斯人的习俗问题时，大都引用了汉文资料的有关记载。

早在 1893 年，帝俄地理学会正式会员 H. A. 阿里斯托夫就出版了他的专著《乌孙和吉尔吉斯或喀拉吉尔吉斯》。该书第 5 章在论及黠戛斯人的风俗习惯时，曾两次引用了从汉文史料转译的文字：“丧葬时并不斫面，只是环绕尸体三次而哭泣，然后把尸体烧掉，一年后再

收集尸骨埋葬。”这显然是采自于《新唐书》的记载“丧不斫面，三环尸哭，乃火之，收其骨，岁而乃墓，然后哭泣有节。”阿里斯托夫在此段文字下注明：黠戛斯人的丧葬仪式与突厥人有相似之处，但并不象突厥人那样“以刀斫面”¹⁴。

巴托尔德的《吉尔吉斯史纲》在谈到黠戛斯人的丧葬习俗时也说黠戛斯人“丧不斫面”。但《巴托尔德文集》的编订者洛莫丁却在此段文字下注释说：“在第二版（按指1943年版）中并没有‘与突厥人不同，（黠戛斯人）丧不斫面’这段话。这段话到底是被作者在手稿中删去的，还是被第二版的主编删去的，其原因并未说明。”¹⁵巴托尔德的《吉尔吉斯史纲》是1927年写成并在伏龙芝（今比什凯克）出版的。1947年，在伏龙芝又出版了该书的第2版。而收入1963年出版的《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的《吉尔吉斯史纲》则是根据第2版编辑的。我认为，第2版中将黠戛斯人“丧不斫面”这段话从文中删去，很可能是该书的编辑者所为，其原因可能是编辑者已通过其他途径得知在一些文献中还有与之相反的记载。

阿里斯托夫和巴托尔德等俄国学者引用的汉文史料，多出自于《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该书的编译者是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九届传教士团领班，也是俄国中国学和东方学奠基人俾丘林（法号亚金甫，又译为夏真特、雅撒特）。他于1808年到达北京，在北京留居14年，通满、汉、蒙、藏语，曾把汉文史料中关于中亚各民族历史的记载翻译成俄文，题名为《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共三卷），由圣彼得堡1851年出版。学者们所引用的关于黠戛斯人“丧不斫面”习俗的记载，是俾丘林根据《新唐书·回鹘传》所附的“黠戛斯传”编译的。显然，俾丘林没有看到或没有注意到汉文史料中还有另外关于黠戛斯人“死丧刀斫其面”的记载。

中国一些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采取了一种谨慎的态度。《柯尔克孜族简史》的作者在谈到斫面习俗时说：“黠戛斯人有没有此种习惯呢？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种记载说有，一种记载说没有。”然后作者在这里所加的注释中例举了《通典》、《太平寰宇记》、《新唐书》和《唐会要》、《册府元龟》几种史料的不同记载¹⁶，但并未轻易下结论。1991年出版的《民族知识丛书》中的《柯尔克孜族》一书的作者，则直接对汉文史料的有关记载作了取舍，“丧葬，要围绕死者哭泣，用火葬，取其骨，满一年后，移入墓内”。¹⁷

其实，除汉文文献外，也有其他资料可以证明黠戛斯人存在着“斫面”的习俗。《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著名的英雄史诗，中国的新疆，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都是《玛纳斯》的主要流传地。新疆的柯尔克孜“玛纳斯奇”（意为“玛纳斯的演唱者”）居素甫·玛玛依演唱的八部《玛纳斯》全本（柯尔克孜文本，共18册，约28万多行）已由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84—1995年出版。苏联、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等也出版了不同文本的《玛纳斯》。新疆人民出版社版的《玛纳斯》第五部《赛依特》中记载了玛纳斯的后代赛依特年轻而亡死后，当他的尸体运来时，已怀有身孕的妻子克勒吉凯悲痛欲绝，她从别人手中抢过刀子，欲殉身而亡，被人劝住，于是她“划破了面颊，脸上流着一道道鲜血”。¹⁸此外，《玛纳斯》中还记载，英雄玛纳斯死后，其妻卡妮凯“划破了脸，泪血交流”。¹⁹我国研究《玛纳斯》的著名学者郎樱对此指出：“《玛纳斯》描述的斫面习俗与汉文典籍中记载的斫面习俗完全相同，这表明斫面习俗在柯尔克孜民众中曾广泛存在过。据说，直到19世纪这种丧葬习俗在民间仍有遗存。”²⁰

关于英雄史诗《玛纳斯》产生的年代，中外研究者一直有很大的分歧，其主要观点有六种：9世纪叶尼塞时期形成说、辽代形成说、成吉思汗时代形成说、诺盖时期（14—15世纪）产生说、10—16世纪形成说和16—17世纪形成说。郎樱先生经过长期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史诗《玛纳斯》的第一部，即史诗的核心部基本形态的形成年代约在13—16世纪，而史诗的第二部至第八部形成的年代显然要晚一些，约在16—18世纪”。²¹虽然学者们对史诗《玛纳斯》产生的年代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大家都公认，它的某些内容非常古老。一些学者认为《玛纳斯》中一些英雄人物等的名字，如玛纳斯、赛麦台依、巴卡依、卡妮凯（Kanikay）等人名，“均为柯尔克孜人信仰萨满教时期（公元700—900年间）称谓，这些人，在以后的辽、准噶尔时期的柯尔克孜人名中是无法找到的。”²²从卡妮凯和克勒吉凯因为丈夫死去而

有劈面的行为来看，在柯尔克孜族中，劈面的习俗早已有之。根据《玛纳斯》的传说，卡妮凯是中亚地区布哈拉王国卡腊汗的公主²³，但在玛纳斯死后，卡妮凯采取的行动是：“在卡妮凯的洁白毡房里，几个忠诚的朋友一起商议。按照柯尔克孜的习俗，雄狮（按指玛纳斯）的遗体放在右边的位置”。²⁴因此，尽管史诗《玛纳斯》形成时间不一，其所描述的柯尔克孜族的习俗也因时代的不同而各异，但从史诗中多次出现的“劈面”习俗来看，它应当就是柯尔克孜族后代对本民族这种古老习俗的真实记忆。

如果说，郎樱先生的“据说直到19世纪（柯尔克孜族劈面）这种丧葬习俗在民间仍有遗存”的论断尚属谨慎的话，那么，19世纪民族学资料则完全证明，在柯尔克孜族中的确存在着“劈面”的习俗。绰干·瓦里汗诺夫（1835—1865年）是哈萨克中玉兹阿布赉汗的后代，在俄国征服哈萨克草原后，他作为哈萨克贵族子弟曾在俄国鄂木斯克武备学校学习过，精通多种语言，以后在俄国军队中服役，并成为俄国军官。他于19世纪50年代曾对天山和伊塞克湖地区的吉尔吉斯人进行过深入的调查，并于1856年5—7月写下了长篇报告《吉尔吉斯人见闻录》，其内容广泛，包括吉尔吉斯人的历史、分布、经济、社会状况、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在报告中，他专列了“吉尔吉斯人的丧葬仪式”一节，其中讲道：“每个吉尔吉斯人死后，其亲属都要为之服丧一年，服丧的详情是：在帐篷上立置四杆黑色的旗子，妻子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放声哭泣以示哀悼。而在游牧的时候，则还举行另外的服丧仪式，即划破面颊。服丧的一年中，妻子不能更换衣服。在追悼宴会举行的第十天以及在服丧一年以后，吉尔吉斯人也象哈萨克人一样要举行赛马活动。”²⁵显然，瓦里汗诺夫在这里所描述的就是吉尔吉斯人的“劈面服丧”习俗。这段记载应当是瓦里汗诺夫亲自调查的结果，因此是非常可信的。此外，由于瓦里汗诺夫还擅长绘画，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常常附有大量的速写画，以补充文字。在描述吉尔吉斯人劈面习俗的这段文字下，就附有他的一幅画。据《瓦里汗诺夫文集》编辑者的介绍，这幅速写画是画在瓦里汗诺夫日记正文上的。画面上是一个吉尔吉斯人的帐篷，帐篷上矗立着一根带有旌节的长矛，旁边写满了瓦里汗诺夫的记录文字，画的题目是“置有长矛和旌节标志追悼的帐篷”。这幅速写画虽然没有出现吉尔吉斯人“劈面”的情节，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瓦里汗诺夫曾经目睹吉尔吉斯人的葬礼，并且用文字和画笔记录下来，这就更增加了他所说的吉尔吉斯人在丧葬时有“劈面”习俗的可信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1、根据各种文献的记载情况分析，唐代的黠戛斯人的确存在着丧葬时“刀劈其面”的习俗，《唐会要》和《册府元龟》的记载正与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以及瓦里汗诺夫的调查资料相吻合，因此是可以采信的；而《通典》、《太平寰宇记》和《新唐书》的记载则不足为凭。

2、《通典》、《太平寰宇记》和《新唐书》的记载有误。至于为何产生这种错误，我们不妨作一个大胆的推测：可能是“丧不劈面”一句中的“不”字，与“刀”字形近而误，即正确的文字应当是“丧刀劈面”，这里的“刀”字，应当是古代汉语中的名词用作状语的一种用法。

[1] 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92页。

[2] 《通典》卷200《边防十六》“结骨”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84页。

[3] 《宋本太平寰宇记》卷199“黠戛斯”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31页。

[4] [法]贝凯、韩百诗译注，耿昇汉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页。

[5] [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7页。

[6] 见耿译本第59页。

[7] 见吕译本第30页。

[8] 见吕译本第81页。

-
- [9] 内田吟风等著、余大钧译：《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69-370 页。
- [10] 内田吟风等著、余大钧译：《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24 页。
- [11] 中华书局标点本《元史》卷 63《地理六·本北地附录》作“撒耳柯思”。
- [12] 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增订本）》，中华书局 1980 年增订第 2 版，第 21 页。
- [13] 《巴托尔德文集》第 2 卷第 1 分册，莫斯科 1963 年俄文版，第 508 页。
- [14] 参见 H. A. 阿里斯托夫：《乌孙和吉尔吉斯或喀拉吉尔吉斯》，圣彼得堡 1893 年俄文第 1 版，比什凯克 2001 年俄文第 2 版，第 164 页正文及注释 4、5。
- [15] 《巴托尔德文集》第 2 卷第 1 分册，莫斯科 1963 年俄文版，第 494 页。
- [16] 《柯尔克孜族简史》编写组：《柯尔克孜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7 页。
- [17] 杜荣坤、安瓦尔著：《柯尔克孜族》，民族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 页。
- [18] 居素甫·玛玛依演唱、阿山巴依整理：《玛纳斯》第 5 部《赛依特》第 2 分册，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柯尔克孜文版，第 367 页。本节译文由阿依达尔和阿斯卡尔先生提供，同时参考了郎樱先生的译文。
- [19] 郎樱：《〈玛纳斯〉与萨满文化》，载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编《玛纳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5 页；又见郎樱：《玛纳斯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9、361 页。按刘发俊汉译本《玛纳斯》第 1 卷、柯尔克孜文版《玛纳斯》第 1 部和第 2 部《赛麦台依》中，在玛纳斯的葬礼上，均未见卡妮凯有“劈面”行为的记载。郎樱先生所据，很可能是《玛纳斯》的另外一种演唱本，即新疆乌恰县的玛纳斯奇艾什玛特所演唱的版本。艾什玛特能够演唱七部《玛纳斯》，但到他去世时，只记录了他所演唱的二部，即《玛纳斯》和《赛麦台依》，共 1.7 万多行。
- [20] 郎樱：《〈玛纳斯〉与萨满文化》，载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编《玛纳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5 页；又见郎樱：《玛纳斯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9、361 页。
- [21] 以上参见郎樱：《玛纳斯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5—100 页。
- [22] 艾尔斯别克·阿比罕著，铁木尔汉译：《史诗〈玛纳斯〉与柯尔克孜族历史关系初探》，载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编《玛纳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3 页。
- [23] 参见居素甫·玛玛依演唱、刘发俊等翻译整理：《玛纳斯》第 1 部上卷，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78—302 页。
- [24] 居素甫·玛玛依演唱、刘发俊等翻译整理：《玛纳斯》第 1 部下卷，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022 页。
- [25] 《瓦里汗诺夫文集》第 2 卷，阿拉木图 1985 年俄文版，第 75 页。

The study on the custom of cutting face of Xijiasi people in inancient times

Mengnan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in University Center Studies of Ethnic Minorities China of Xinjiang University LanZhou Univercity, urumuqi Xinjiang830046)

Abstract: "cutting face "is an old and strange tradition in northwest and northern of China when some national minority held some meetings such as funeral, seeing off and Complain of injustice in ancient times. Whether Xiajiasi people in ancient time exists" cutting face" custom or not had some rifts in the documents of Tang Dynasty and Song Dynas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written Chinese documents, national minority data and of the Russian data, this paper emphasizes to excuse this problem and make conclusion that Xiajiasi people in Tang Dynasty really exists the custom of " cutting face" when funeral hour.

Key Word: tradition cutting face Xiajiasi

收稿日期: 2003 年 6 月 19 日

作者简介: 孟楠，男，新疆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